

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2003年9月10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钱其琛

很高兴又有机会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见面。今天是教师节，首先还是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其次对新学年刚刚入校的新同学表示欢迎，并祝贺你们人生新的阶段开始。还要祝贺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为战胜“非典”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希望大家在新的学年里，在学习、工作、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新的进步。

去年的教师节，我主要就“9·11”事件以后的美国以及中美关系为题做过讲话。一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其中最令人关注的事件就是伊拉克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从3月20日开战到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主要战事结束，总共只有六周，实际上真正打的时间也就三个多星期。对于这场战争的进程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今天想谈的是如何从大的国际背景来看待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美国的战略趋向有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还得从“9·11”事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谈起。“9·11”事件后，美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所谓“后冷战时代”。美国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主要标志是，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再面临苏联的威胁。后冷战时期的标志是美国面临全球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重点的次序发生重大变化。

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成为美国战略的主要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两年以来美国的战略调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反应阶段，时间大约从“9·11”到2002年初。由于200多年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如此严重的袭击，美国迅速做出强烈反应，一方面大力加强本土防卫，酝酿设立国土安全部，改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另一方面调动全部外交资源，以反恐划线，组建国际反恐联盟，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政权。在这个阶段，美虽然借反恐进入了过去难以插足的中亚地区，但总的态势还是做出反应，加强防御。

第二个阶段是酝酿阶段，时间大约从2002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到2003年2月出台《反恐战略》。在这个阶段，美对其全球军事安全战略进行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反思，先后出台了《毒品管制战略》、《国土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防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电脑网络安全战略》、《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和资产战略》、《反恐战略》等一系列文件。其中最具有指导意义和标志作用的是布什的两次重要讲话：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首次提出存在所谓“邪恶轴心”；同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时，布什又提出“先发制人”的战略。

这个阶段有三点变化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美国把恐怖主义袭击看做战争行为，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手段，而不是传统的行政和司法手段来对付恐怖主义。这使得美对外政策中的黷武倾向上升，美政府内部国防部对美外交决策的影响明显增大。

二是美国反恐的打击对象发生变化。“基地”组织受到重创后化整为零，美难以找到集中打击的目标，因此把主要目标定在防范恐怖主义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美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宣称“流氓国家与恐怖主义是天然盟友”，美国要防止这些国家将“最致命的武器”扩散到“最危险的敌人”手中。这样，美就将反恐与防扩散和整治“流氓国家”挂起钩来，并进一步提出要改造中东。在阿富汗、伊拉克之后，朝鲜、伊朗、叙利亚也成为美重点关注的对象。

三是美认为所谓“虚弱和失败国家”容易为恐怖组织所利用，中东、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所谓“不稳定弧”是反恐的薄弱环节。为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和反应能力，美宣布将重新评估其军力结构，并考虑调整海外军事部署。这样，美就可以以反恐为名，加强对战略要地的控制。

第三个阶段是实施阶段。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已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全球军事安全战略。

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拉克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美国长期奉行“遏伊倒萨”政策，拒不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伊拉克方面也不时中止与联合国在武器核查等方面的合作，授美口实。从深层次看，解决伊拉克问题，是美加强控制中东，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巩固一超地位的重要一环。据法国《费加罗报》今年4月18日的一篇文章报道，早在布什上台以前，以美现任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新保守派”就在2000年9月出台的“美国新世纪”计划中，明确提出了“打伊倒萨”的设想，作为加强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确保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第一步。

这次，美有意借助“9·11”后国际社会重视反恐和防扩散合作的有利气候，拔掉萨达姆这颗钉子，将中东这一战略要地和油气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重新爆发以来，尽管联合国通过1441号决议，要求继续进行核查，美英在伊周边集结重兵的举动从未放缓。美其实早已下定决心，无论是否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都要开战。美英之所以还要提出新决议草案，是想披上联合国的合法外衣，“师出有名”。

其他大国和国际社会对此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安理会内外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美英在修改了新决议草案并一再推迟表决时间之后，仍无望通过新决议，美国不得不知难而退，放弃寻求表决，在向萨达姆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之后，匆匆发动战争。这说明，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其他大国不愿轻易妥协，但也不愿与美直接碰撞。国际社会并不接受美搞单极世界，也不愿看到美为所欲为。

有一个细节大家也许注意到了：3月20日布什宣布开战时，背景是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两个女儿，另一张是他的夫人与爱犬。布什希望借此表现出他重视家庭、尊重人性的一面，以与美声称的解放伊拉克人民的开战目标相呼应。但是到了5月1日，布什乘战斗机飞到从海湾返航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主要战事结束时，航空母舰这种背景反映了美国决心使用武力的心态。

这次战争从军事角度讲是比较成功的。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动用了55万兵力，轰炸了近40天，地面部队只打了不足100个小时。而这次美军投入兵力不足上次的

1/3，却从一开始就展开地面进攻，21天就长驱直入拿下巴格达。但是，还不能说美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一方面，国际社会对美英发动战争的理由不断提出质疑。美英迄今仍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伊拉克的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与“基地”组织和“9·11”事件有关系。倒是美国国内发现，“9·11”后引起美全国恐慌并导致五人死亡的炭疽病毒，可能是由美国生化武器专家从美国军队的实验室里偷出来的。美英国内甚至有舆论认为，两国政府在伊拉克违禁武器的情报问题上有意造假，误导本国人民。英国议会外委会调查认为英政府处理情报不当，夸大了伊违禁武器的严重性。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提供有关消息的国防部武器专家凯利突然自杀，更是在英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也就情报问题举行秘密听证会，准备竞争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约翰·克里和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安则公开指责布什政府有误导公众的行为。有报道称，布什总统在今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关于伊拉克试图从尼日尔购买核材料的指责竟是源于一条未经证实的、甚或是伪造的情报。美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赶紧出来发表声明，主动承担失察之责。布什总统也不得不表示他要承担责任。

面对各方质疑，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又提出新的说法：美国政府其实并没有得到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新情报，而是“9·11”事件使美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以前的情报。拉姆斯菲尔德去年6月曾讲过这样一句俏皮话：“没有证据并不等于证明没有（The 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华盛顿邮报》6月22日一篇文章认为，“迄今为止，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对此予以解释，给美国的军事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这曾是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必要和充分理由。现在，先发制人的理论——布什外交政策的核心——处于危险之中。”英国《独立报》则发表文章，详细列举了美英为进行战争而编造的20个谎言。

另一方面，从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主要战事结束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伊拉克局势还没有平静下来。大家可能还记得，战争开始的时候，北京的“非典”问题刚刚露头。现在“非典”风波已过去，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却还没有理出头绪来，依然面临不少问题：萨达姆仍然下落不明；反美示威不断，要求美军立即撤走；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不断，5月1日以后美军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此前战事激烈的时候，而从开战到现在的阵亡总数大大超过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拉姆斯菲尔德也不得不承认，伊拉克局势不稳的状况可能至少要再持续数月。因此，美国向不少国家发出了派出协助维持秩序的邀请，并发动了多次清剿行动。但目前这种美军平均每天超过一人死亡的窘境恐怕一时还难以摆脱。这说明，军事打击易，征服人心难，改造社会就更难。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由于美英联军在伊接连受到袭击，重建工作也进展缓慢，美国人对美占领伊拉克的支持率从4月份的73%下降到50%左右。

最近布什总统又专门就伊拉克问题发表讲话，意在着眼大选，争取国内支持，迫于国际压力，寻求国际合作。

我们可以将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大致做个比较。

这两场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在美调整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视为对其最现实的威胁之后发动的局部战争；都声称目标是铲除独裁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推行民主，解放当地人民；也都达到了使美进入战略要地的目的，客观上有利于美继续推进单极战略。在

这两次战争中，美都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很快得手，伤亡都很小，但也都没有抓到拉登和萨达姆等主要打击对象，并面临持续不断的抵抗活动。

但是，这两场战争也有两个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国际反应不同。美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攻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是师出有名，得到国际社会一定的同情和支持，一些国家还派兵参加多国部队，并为阿重建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在伊拉克问题上，美英等国不顾绝大多数国家和全球反战力量的强烈反对，不顾十多年来联合国在对伊拉克进行全面制裁和武器核查方面取得的进展，在并无确凿证据、也无法争取到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国际社会的总体反应是消极的。

其次是战争目标不同。美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标比较明确、有限，主要是要打掉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打垮塔利班政权，也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而不是为了改造阿富汗。所以美不仅借重北方联盟的力量，而且也考虑占阿人口多数的普什图人的利益，连国王查希尔也照顾到了，以保持各种力量间的平衡。打垮政教合一的塔利班政权，客观上也起到恢复阿富汗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的作用。所以阿富汗反对塔利班的各大派别基本上都参加了波恩大会，并推举出卡尔扎伊，组建了较为平衡的新政权。虽然新政权仍面临许多问题，难以发挥作用，但毕竟在喀布尔建立了一个当地政权，外国使馆也能恢复活动。美国还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继续清剿“基地”组织。

但在伊拉克，美的目标要大得多，不仅要摧毁萨达姆政权，还要将伊改造成一个建立民主制度、摆脱伊斯兰教传统的自由国家，成为阿拉伯、中东地区国家的民主样板。这样的目标很难吸引伊拉克的反对派。而且萨达姆政权本来就是一个世俗政权，不少反对派，特别是在伊拉克境内有影响的派别基本上都有部族或宗教背景，他们既反对萨达姆，也反对美国。因此，美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新成立的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性受到强烈质疑。外国使团也无法恢复活动。

由于战争目标的扩大，美军在推进过程中重点打击萨达姆政权的党政军警系统，基本摧毁了原有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真空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社会秩序混乱，抢劫和复仇现象严重。美军被迫维持治安，既增大了美军伤亡的可能性，也强化了“占领军”的角色，更难为当地人民接受；另一方面，伊斯兰宗教组织的影响日趋上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olas Kristof，曾任驻京记者）6月24日从巴士拉发回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打垮萨达姆政权，受益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巴士拉，一些出售酒精饮料的店主遭到枪杀，电影院业主整天提心吊胆，不少店铺都挂出“姐妹们，遮住你的头发”的提示牌。在萨达姆时期，巴士拉大学科学系80%的学生是女性，现在不少家长都要求女学生在校园里蒙上头巾，以避免麻烦。所以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遮住你的头发》。该报道还介绍说，当那些流亡的反对派人士在伦敦享受的时候，原教旨主义者则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活动，并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支持。这篇报道的中心思想是警告：一个原教旨主义的铁幕可能降临到伊拉克。

伊拉克之战结束以来，各国舆论对美国反恐战略的动向有许多议论。据《国际先驱论坛报》载文称，布什总统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是，美国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使命，美国反恐战争的胜利之日，就是这一使命完成之时。完成这一使命的障碍则是“多极的”、平衡的国际关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6月26日在伦敦国际关系战略研究所讲话时对此做了详细的

解释。赖斯说，应当打破自 17 世纪民族国家崛起所形成的大国间对抗这一破坏性的国际体系；欧洲各国必须摒弃多极化概念，因为该观念并未真正推进和平；多极化是大国间对抗和价值竞争的理论。

文章作者认为，赖斯的说法是应有一个新的体系取代多极下的联合国，同时超越北约的极限。现今的北约不能让美满意，因为实质上其内部也在多极化，其内部平等是美国的障碍。

看来赖斯的讲话是针对美欧政权呼吁重塑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反应。5 月 14 日，美国前政要奥尔布赖特、布热津斯基等 18 人发表了主张改善美欧关系的共同声明。6 月 14 日，欧洲前政要科尔、德斯坦等人积极回应。他们的共同意见是强调面对全球性挑战，需要美欧团结；美欧的生存和发展是祸福相依；美欧加强在世界热点问题上的合作，共同承担国际安全责任。

从双方的论点来看，美方反对多极化，认为这是造成大国间对抗的破坏性因素，是美国推行和平使命的障碍。欧洲则强调应当合作，共同承担国际安全责任，若无欧洲相助，美国不可能单独应付挑战。

美国在 200 多年的历史对欧洲更多地是执行“中立”政策。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目的是防止年轻的美国被欧洲的战争所吞没。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直到 1917 年 4 月才对德参战。1939—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直到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后才参战。

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经济、军事实力上的超级大国。经过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美国现在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如有人认为凭借这种军事、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就可以推广单极论，势必谋求单极的行动自由，甚至违背国际法，破坏联合国，走上奉行武力至上的帝国政策的道路。

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开始更深入的反思。

例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2003 年 5 月号刊登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裴敏欣的文章《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这篇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在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攻击近两年之后，国际舆论从对美国及其人民的衷心同情转变为不加掩饰的厌恶。这一转变直接的催化剂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强硬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更确切地说，对美国的忧虑不断增长，应被视为对塑造和推动美国对外政策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的一种全球性的强烈反弹。”

文章认为，美国人非常爱国，根据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调查，70% 的被调查者对自己作为美国人“非常自豪”，而在其他西方国家，这一比率不足 50%。但美国人却回避民族主义这个词，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美国自视为文化和种族的大熔炉，认为“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美国的民族主义基于自认为是普世性的价值观，而不是文化或种族；其次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和向前看的，因为短暂和荣耀的历史记忆使其坚信未来会更加美好，因此美国对于曾经遭受屈辱和挫折的绝大多数民族的悲情诉求和向后看的心态缺乏理解和同情。

因此，美国的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理想、民族自豪和孤立主义的混合物，具有与生俱来的高傲和传教士精神。其悖论在于，美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却否认和鄙视民族主义，这必然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并导致三个直接的后果：一是引起外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怨恨，二是在试图破坏外国敌对政权时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三是使美国在海外追求国家

利益的行为被视为伪善，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合法性。

其实这篇文章讲的不是一个新问题。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西方列强在进行侵略扩张时，都曾表现出这种民族主义的悖论。西方国家认为，基督教伦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得以成功的三大支柱，而这三者都具有普世性，超越了所谓“化外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因此，资本主义在进行全球扩张时，往往先由传教士打头阵，“以开教化”；商人紧随其后，“以通其利”；时机成熟后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直接对这些所谓“化外蛮族”进行全面的改造，并将被改造民族保护自己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努力视为“狭隘”甚至“邪恶”的民族主义。

近期，在美国内就“美利坚帝国”问题展开了辩论。

所谓“美利坚帝国”，其含意就是美国是不是“帝国”，要不要发挥“帝国”的作用。主张美国应当成为帝国的一派被称为“新保守派”。他们认为美国应当凭借超强的实力在全球推行美政治价值观，对“失败国家”先发制人，进行攻击，以美为模式进行改造。英国牛津大学一历史学家告诫美国政府不要否认美的帝国作用，要学习19、20世纪大英帝国在全世界推行“繁荣与进步”给世界做出的“贡献”。“传统保守派”反对“美利坚帝国”的提法，认为这样做很危险，主张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以引发对美国今日的反思。有人还发起成立“维护共和国委员会”，准备在纽约召开“美利坚帝国”研讨会。“自由派”也反对建立帝国，主张用柔性方式发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美国政府内部对“美利坚帝国”的提法有分歧。布什总统多次强调美不是“帝国”，与以往“帝国”的做法有质的不同。但在执政团队中，不少人主张用武力输出美国价值观，建立“美利坚帝国”。

总起来看，参加辩论的各派在维护、加强和延长美国超强独霸地位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这场辩论对美国今后的对外政策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发表题为《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实力与战略》的文章，文中指出，布什政府内部对新战略如何实施意见分歧，一些人想摆脱二战后美建立的国际制度框架，另一些人认为在原有框架内行事可更好地实现目标。约瑟夫·奈认为，对美而言，与其忽视联合国或试图改变其结构，不如与其他拥有否决权的大国合作，利用联合国，推进新战略。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事务是连最强大的国家都无法操控的。力量的扩张不能超过公众的容忍限度。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公众对“帝国”不感兴趣，无意入侵叙利亚和伊朗，相反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和利用联合国。

8月3日的《洛杉矶时报》载文认为伊拉克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可能转向温和、克制，从打一场高代价的战争转向撤离热点地区，从高代价干预行动转入低成本的外交斡旋。原因是大选在即的因素、美国公众心理因素、情报事件和战后重建困难的因素。

所有这些都是上述辩论的反映。究竟如何，大家可以继续研究。

下面再来谈谈当前的中东形势。

伊拉克战争对该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目前，美已开始将更多注意力转向伊拉克的邻国和中东地区。4月30日，美、俄、欧盟和联合国组成的“四方机制”正式向以巴双方递交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美国重新推动和平进程，希望以此缓解国际压力，安抚阿拉伯世界，同时借打垮萨达姆政权之势，强化其在中东和平进程的主导权。这可以说是美重塑中东政治版图的第二步。目前，“哈马斯”等激进组织面对各方压力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

及所谓“定点清除”行动，同意停火数月，但和平进程仍面临重重困难。最近又出现了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辞职，以色列袭击“哈马斯”事件，“路线图”计划受阻。

美国原希望打垮萨达姆政权和排斥阿拉法特之后，巴勒斯坦反以活动会有所减少，有利于巴以和解。实际情况却是，“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中的影响正在继续上升，在最近一次联合国驻加沙福利和就业办事处职员委员会的选举中，被美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哈马斯”赢得了近80%的选票。分析家认为，“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坚持对以色列的抵抗斗争，其政治组织则通过慈善网络向加沙地带的居民提供大量援助，这是“哈马斯”获得选举胜利的两大重大原因。较之拥有豪宅、衣着考究的巴勒斯坦内阁成员，生活俭朴、出生入死的“哈马斯”领导层更能赢得巴民众的支持。因此，美若不能公正地处理巴以冲突，而是继续奉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必将引发新的冲突和更为复杂的形势，中东和平进程将再次面临夭折的危险。

美国想改造中东，还要解决另外两个关键问题，即叙利亚和伊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对叙利亚相对客气一些，对伊朗则盯得很紧。一方面，伊朗的力量大一些，对中东的很多激进组织有影响，伊拉克境内也是什叶派居多，他们既反萨达姆，又反美国。另一方面美国与伊朗有历史恩怨。伊朗与阿拉伯在历史上是世仇，但也是穆斯林国家，原来受苏联影响比较大，二战时斯大林就是选择在德黑兰与罗斯福会晤。二战后，伊朗的巴列维国王亲美，美也想把伊朗变成反苏的基地，大力支持巴列维搞西化。结果在伊朗形成了美式上层与穆斯林下层，社会分化严重，民众仇美情绪非常强烈。巴列维国王被霍梅尼革命推翻后，美伊关系不断恶化。后来发生了伊朗扣押美国使馆人质事件，卡特总统出兵营救人质失败，断送了政治生命。这大概也算是美国处理外国民族主义失败的一个例子吧。

所以在两伊战争期间，西方国家一致支持萨达姆，特别是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没想到萨达姆从中尝到甜头，误以为入侵科威特西方也不会反对。但是这次，萨达姆就威胁到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美国不能接受。这才有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2年制裁后的伊拉克战争。

从目前的中东海湾形势和美国内情况来看，美国在大选前再打一仗的可能性不大。不过，这次伊拉克战争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前面我们谈过，美国现在要先发制人。它认为哪个国家不好、被怀疑支持恐怖主义、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和平，它就要主动进攻。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中国是个大国，只要我们自己不乱，好好发展，把自己的事办好，在国际上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其他国家也不敢轻易跟我们搞对抗。其次，“9·11”后，美认识到反恐和防扩散需要大国的合作，对我们的压力有所减轻，导弹防御叫得也不那么凶了，最近几次拦截试验失败大概与投入不够有关。第三，现在美国的战线越拉越长，比如菲律宾跟美关系不错，反恐遇到困难，所以美国就派兵去了。利比里亚国内出了问题，涉及不少美国后裔，布什也要考虑是否出兵。阿富汗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伊拉克问题上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不可能都改造成“美式自由”国家，首先宗教传统就改不了。世界上这么多事情，美国沾点边就想管，恐怕力不从心。

以前我们关注过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问题。这几年，美在亚太的投入增加了，特别是“9·11”后在一些地区加紧投棋布子，但还不能做出美国战略东移的结论。

首先，美全球战略的重点仍在欧洲地区。近来，欧美关系有了新的变化。欧美过去也有

矛盾，这次在伊拉克问题上算是闹得最凶的一次，虽然联盟关系还在，但毕竟有了严重的裂痕。美国声称可以原谅俄国，也不追究德国，但不能放过法国。美还提出了“新”、“老”欧洲之分，有些“新欧洲”国家跟着美国走，如波兰，美国就让它伊拉克管一块地方。但是，法德毕竟是欧洲的主要力量，这个矛盾发展下去，美对欧洲的传统影响还会缩小，将来欧美关系也不会太平静。

其次，从军事上看，美军还不需要在亚太地区大规模加强部署。美军现在要打仗，可以远距离投送。基地前挪后退都没有关系，航母来了就是基地。远程轰炸机还可以从本土起飞，离战场老远就可以扔下精确制导的炸弹，然后往回飞，完全是按事先拟定的程序走。美军现在的问题是怕离战场太近，驻韩美军还要后撤 200 公里。但是有一条，现在看来，美国每打一处，都需要时间来调动力量，还要花很大的力量做很多国家和国内老百姓的工作。

再次，当前及今后很长时间内，美主要任务是对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希望谋求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美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我国进行战略围堵，因为亚洲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参加反华“包围圈”。

所以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家，中美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还是很有可能的，20 年的机遇期也是现实的。

算起来，今天已经是我第五次到这里来跟大家交流了。五年来，国际关系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对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辛勤劳动，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已经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我也要向北大领导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我祝愿在座的年轻人能早日成长，为国家的未来做贡献。

(责任编辑：王 联)

(上接第 24 页)

第二，学者分析角度的不同。塞尔维斯将他归于冲突派的主要理由是斯宾塞对征服作用的重视以及对胜利者永久征服失败者从而导致国家产生这一点的强调，在于“斯宾塞通常更强调进化过程中胜者生存的选择过程”。虽然斯宾塞同时承认国家的整合作用和镇压作用，但哈斯却坚持将斯宾塞列入国家起源的整合论流派，其根本原因是，在斯宾塞看来，“战争在内源的政治演进过程中主要是作为一种整合途径”。

第三，人类历史的复杂演进使然。冲突和整合并非界限分明，更多的是互相联系、交替出现，甚至同时并存。历史上国家的起源往往通过多种途径，决非仅遵循单一路线。不论是摩尔根提出的易洛魁部落联盟或印加古国的发展，还是恩格斯概括的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人国家模式的演进；不论是两河流域古代王国的起源，还是中华文明古国的形成，它们既有整合的成份，又有冲突的例证；既有对内的调节和融合，又有对外的征服和兼并。

历史上出现的理论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史实，它为当代政治理论乃至政治现实提供了应有的注释，问题在于学者的发掘。

(责任编辑：王 联)